

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 及其相关辨思

□ 尚 斌 张铁军 张军成

摘要:通过对“实事求是”一词进行辨析,我们认为国内学者在引用“实事求是”来论证毛泽东思想精髓时,对该词语最早出处的文献表述不够严谨,对“实”字原初词义解释不够准确。而“实事求是”一词本来与儒家思想有关,起初是对汉代解经方法的概括,明清时期的考据学与之关系紧密。毛泽东早期对“实事求是”一词产生认知的重要因素是湖湘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共同为毛泽东后来改造和升华“实事求是”一词内涵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实事求是”;来源与认知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92(2016)02-0058-005

DOI:10.15944/j.cnki.33-1010/d.2016.02.007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写于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一词作了注解,这是毛泽东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①今天,我们对“实事求是”这一原本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色的命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能够对该词语的历史来源及属性进行一番辨析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学界对“实事求是”的引述及其辨析

自毛泽东首次全面阐释“实事求是”这个词语之后,国内学者就不断引述,用其论证毛泽东思想,主要观点归纳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最根本的方面;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不过,学界在引述和解释“实事求是”一词时存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深究的地方,我们将其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 词语最早出处的文献表述不够严谨

许多学者认为“实事求是”一词最早源于《汉

收稿日期: 2015-06-03

作者简介: 尚斌,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张铁军,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军成,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儒家文化认同及其现代性”(编号:12XKS008);甘肃省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儒家文化认同研究”(编号:GSZS019)。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书·河间献王传》一章,如李胜章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事求是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31)、田湘波著的《毛泽东名言问世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42)、高懿德撰写的《“实事求是”理念的三重意蕴——“实事求是”理念的实践论解读》(《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毕国明撰写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而刘宏撰写的《乾嘉学术系统新论——以“实事求是”为中心》(《学术界》,2014年第10期)一文则认为“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可以说这两种表述都不够严谨。通过翻检《汉书》,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第五十三卷只有标注《景十三王传》的篇名,并无《河间献王传》一说。班固在《景十三王传》中记载西汉孝景皇帝刘启有十四个儿子,其中刘彻成了后来的孝武皇帝。《汉书》在前面十二纪中已经单独为刘彻作传,在本传中一语带过,只是简单提到刘彻的生母是王皇后。在《景十三王传》中重点介绍刘启之子刘德的一生,然后简要介绍了其余十二子。刘德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他被封为河间王,封地在河间国(今属河北省)。刘德为王26年,汉武帝元光5年(公元前130年)卒于王位之上,朝廷所赠谥号为“献王”,以褒赞其聪明睿智。本传虽然对刘德着墨较多,但字数总共不到四百,就本章整体内容而言也不属于主体,不会单独成为一篇传记。由此可知,《景十三王传》乃是刘启十三个儿子(刘彻除外)的合传,并非刘德一人的独传。虽然学术界一般喜欢将多人合传的著作在引用时只引所要用的主要人物名字,并认为这是习惯,不能算差错,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习惯表述恰恰能引起许多对原本史料一无所知的读者的误解,即使是有些学者在转述别人对“实事求是”一词出处的观点时,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了解《汉书》中这一章节的真实内容,而只是人云亦云,缺乏深究。尤其是在我们追根溯源地注明该词语的文献出处时,如果不遵循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模糊或

回避史书章节标题的本来面目,将会造成更多的误解。因此,笔者认为“实事求是”一词最早文献出处更为严谨的表述应该为《汉书·景十三王传》。

(二)“实”字原初词义解释不够准确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注解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对“实事求是”一词给出了全新解释。毛泽东在此处把“实”字当作形容词,意思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对这个解释,似乎还应补充一点,即实事求是中的‘实’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是查实、核实、落实一类的意思,‘实事’不是简单地指事实,而是指‘实其事’,就是说要确凿地查实事情的真相,弄清实际的状况,也就是颜师古说的‘务得事实’。”^①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汉书》是在东汉时期编撰完成的史书,我们通过考证发现,在两汉以前“实”字并没有“查实、核实、落实”这些词义,它们不过是后来才产生出来的引申义。“实”字的繁体字为“實”,东汉学者许慎认为其本义为“實,富也,从宀从贝。贝,货币也。”^②所以,“实”字本义是指财物的“富有”、“丰富”,最初只是一个形容词。毛泽东对“实”字原初词性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是对原初意义作了引申和改造。另外,关于“是”一字,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为“是,直也。直部日,正见也。”^③可见,“是”字本义是“正见”,即正确的见解。所以,笔者认为《汉书》中“实事求是”一词的原初意思乃为“通过丰富的材料,进而从中求得正确见解。”

我们结合《汉书》所关联到的当时历史文化背景,就更加容易理解“实事求是”一词的原初含义。我国先秦文化典籍原本十分丰富,但主要刻在竹简或木简上,很难保存下来;再加上焚书坑儒,楚汉连年战争,汉初朝廷忙于平定叛乱和对付外族入侵等因素,导致汉初统治者无暇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到汉武帝执政时期,先秦存留下来的文化

① 周为民《实事求是的“实”是动词》,《光明日报》2005年2月2日。

② 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版,第150页。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5页。

典籍毁损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传授和解读先秦典籍主要依靠那些经历焚书坑儒而幸存下来的老年儒生的口授,对同一部典籍的解说众说纷纭,难以判定究竟哪种说法才符合原文。《汉书》中载有“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①这段史料记载刘德搜集到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先秦古籍,这其中多数是关于儒家学派的第一手资料,数量之多竟然与西汉朝廷藏书相等。刘德统治的河间国虽然面积很小,但在汉初的诸侯叛乱中,却保持了安定,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发动各方力量收集校对古籍,并努力从这些非常丰富的材料之中探求出符合先秦原始儒家思想的正确见解。“实事求是”一语本来是指河间献王刘德所采用的一种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而古文经学又是汉儒训解和阐述先秦儒家经典的学问,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流变影响很大,因此,“实事求是”一语的深层阐述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哲学)。

二、“实事求是”一词的文化根脉及其考据

“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我们能有较为开阔和宽广的视野,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内部,作一点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正是这一理论线索。”^②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其思想来源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虽然先秦诸子百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其思想内核其实在先秦原始儒家等学派当中已经产生。孔子认为“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了解就是了解,不了解就是不了解,这就叫做明智。这句话强调注重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不主张弄虚作假,

主观臆断。同时,孔子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寻得正确见解。孔子也认为“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自己没有不懂却凭空虚造的毛病。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孔子早在青壮年时期以及后来的周游列国期间,就非常注意考察收集有关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实物以及相关文献,涉猎广泛,掌握了大量真实可信的资料。在不断丰富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孔子带领弟子最终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即后人所谓的“六经”。孔子曾对颜渊说“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后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列子·仲尼》),可见孔子编辑、整理“六经”的真正目的是经世致用,治理天下。

《汉书》记载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③刘德把整理好的儒家经典用作教材,选拔人才,设立了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依照古代礼乐制度,进行实际操演,要求群臣动作言行都要合乎儒家规范,体现了儒家思想学说的社会功用。班固对刘德评价极高“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④《汉书·艺文志》在列举儒家文献时提到《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和《河间周制十八篇》,且班固认为后者十八篇似乎也是河间献王所述。由此看来,刘德不但为保存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做出过贡献,也为研究阐述儒家思想做出过贡献。史学家范晔指出《汉书》中就贯穿着浓厚的儒家思想,“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⑤《汉书》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儒家正统思想观念来处理历史人物。换言之,“实事求是”一语就是具有浓厚儒家思想观念的历史学家班固以极为精简的语句高度浓缩和概括了刘德为整理、研究儒家典籍而使用的学术考证方法,并且产生于后世的考据学与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10页。

② 魏胤亭《实事求是论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36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36页。

⑤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4页。

这种方法一脉相承。

“自《汉书》以后,或引录献王传,或阐学述事而用到‘实事求是’一词者屡见不鲜。仅《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4千种书中,就出现过65次。而唐、宋以后的用法中,取义已与现在没有多大的区别。”^①在汉代之后“实事求是”一词的出现频率很高,然而这一命题的儒家学派属性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直至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盛时仍是如此。乾嘉学派治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关于儒家经典研究考证的内容占多数。乾嘉学派还特别重视客观资料的广泛收集,归纳研究,不以主观想象妄作判断,含有可贵的严谨治学精神。尤其是阮元在学术研究中直接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家所开创的实事求是治学方法,在他所撰的《擘经室集自序》中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②同时,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考据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乾嘉学派中除阮元之外,惠栋、戴震、钱大昕等都是“实事求是”学风和方法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一词虽然最早出现于《汉书》,但其最初生成与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学说密不可分。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无论就其学术考证的主要领域,还是其学术考证手段,都带有被先前时代深刻影响的痕迹,并且在乾嘉学派中得到了极致发挥。因此,辨析“实事求是”一词渊源不能仅仅停留在《汉书》中,需要我们能够将它置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学术发展历史等宽广的视野下去解读。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无论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根源还是其以后的改造、运用,基本上都是和儒家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有关。只有了解清楚了这些,我们才能更为明晰地去探知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语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

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知及其来源

毛泽东早年就开始饱览经史子集,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后来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

深入和发展,他不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加以批判和改造,吸取精华,推陈出新,对“实事求是”一词的改造创新就是一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化用“实事求是”一词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就直接来源于《汉书》。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最早认知我们已很难确定。关于毛泽东早期就“实事求是”一词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一些学者往往只从湖湘文化注重务实、反对空谈的学风说起,笔者认为这样去论述难免给人一种较为空泛笼统的感觉。因为,按照现代文化结构理论,人们一般将文化分为四个大的层次:即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次和思想与价值层次。这四个层次中,物质层次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思想和价值层次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而制度层次和风俗习惯层次,则是介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有弹性的媒介。作为思想和价值层次中的哲学思想,又是全部文化的灵魂。^③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毛泽东早期对“实事求是”一词产生认知的重要因素。

(一)湖湘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对个人思想观念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是湖湘物质文化体系的重要代表,书院中心位置的讲堂檐前曾悬有“实事求是”一匾,该匾由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于1917年学校迁入岳麓书院而撰写。由于清末学制改革之后,岳麓书院的教育体制也相应发生变化,为适应社会需要,宾步程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结论。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文与《汉书》有承接关系。1913年,19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4年合并为第一师范,一直到1918年毕业。“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寓居半学斋,‘实事求是’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过影响。”^④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曾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半学斋就是岳麓书院内右厢的一处建筑,是以前的师生居舍,毛泽东早期对岳麓书院内

① 子厚《“实事求是”的出典》,《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4期。

② 阮元《擘经室集》(上),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页。

③ 万里《湖湘文化大辞典》(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④ 江堤、彭爱学《岳麓书院》,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实事求是”一匾应该留有深刻印象。岳麓书院内“实事求是”一匾也是毛泽东早期对“实事求是”一语产生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二)湖湘思想文化。大量资料表明,湖湘文化无论对早期还是中后期的毛泽东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历代湖湘学者大都倡导务实践履、实事求是的学风。例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是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强调言必证实,义必切理。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代表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①曾国藩承前启后,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明确揭示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大命题间的理论联系,完成了“实事求是”命题由考据学向哲学、特别是认识论意义的转换,值得后世肯定。我们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之中可以看出早年的毛泽东不止一次称道曾国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曾国藩等湖湘思想文化名人对于青年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结合当时的湖南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底蕴,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历史上湖湘思想文化杰出人物关于“实事求是”学风的提倡或者将其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论证,都是早期毛泽东“实事求是”一语产生理性认知的重要因素。

虽然,湖湘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对早期毛泽东“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起了作用,然而,湖湘文化毕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区域文化,谈论区域文化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分

别代表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在谈论“实事求是”一词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之时,仍然不能摆脱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湖湘文化对早期毛泽东“实事求是”一词认知所起的作用也只能说是“外因”;早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还有其“内因”。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行动和实践,没有陷进故纸堆中去求是,发扬了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主张。这些特点在早期毛泽东身上体现突出,譬如,毛泽东在写于1914年的《讲堂录》(“修身”和“国文”课的笔记)中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研究事实和真理”。^②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同学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社会状况,体察民间疾苦。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毛泽东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也充分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非凡个性和气质,为他以后改造和升华“实事求是”一词的内涵铺垫了基础。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丰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认识日益加深。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题写“实事求是”一语作为该校校训。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概念。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的全新解读,就它的基本原理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革命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可谓古今结合,中西合璧,进而真正实现了由先秦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向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质的飞跃。□

(责任编辑:熊 觉)

①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66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